

关于李秀成及其自述评价問題

—論 文 章 选 集 —

黑 龙 江 省 历 史 学 会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

目 录

評李秀成自述

——並與羅爾綱、梁崑蘆、呂集義等先生商榷

.....戚本禹 (1)

怎样对待李秀成的投降变节行为?戚本禹 (17)

主观唯心主义历史观的恶果

——罗尔綱同志为什么會把叛徒裝扮成英雄

.....炳然、大可 (52)

李秀成是太平天国革命的叛徒

——与苑書義、呂翼祖、朱仲玉商榷

.....唐贊功、孙恭恂 (64)

怎样认识中国历史上农民的阶级性

——評李秀成問題討論中所謂“历史的阶级的局限性”問題

.....罗思鼎 (75)

忠王李秀成的苦肉綵兵計羅爾綱 (92)

評李秀成

——與戚本禹同志商榷

.....周衍發 (120)

李秀成及其自述的評價

——與戚本禹同志商榷

.....苑書義、呂翼祖 (129)

英雄一世，糊涂一时朱仲玉 (142)

李秀成及其自述評價問題論戰文章索引 (149)

評李秀成自述

——并同罗尔綱、梁岵庐、呂集义等先生商榷

戚本禹

編者按：关于李秀成及其自述的評价，是学术界一个有爭論的問題。本报摘要轉載的戚本禹同志的这篇文章（原載《历史研究》一九六三年第四期），是关于这个問題的一种意見。

太平天国后期的重要將領忠王李秀成，在一八六四年（同治三年）七月二十二日被曾国藩的军队俘虏了。他在敌人的囚籠里写了一个自述。这个自述，从它的根本立場来看，是一个背叛太平天国革命事业的“自白書”。

矛盾的历史現象

历史的現象是多么矛盾。驍勇善战、叱咤風云的农民革命將領却写了一个阿諛奉承、卑躬屈膝的“自白書”。怎样对待这件事，怎样理解这件事？

有人曾經簡單地否定自述的真实性，來为李秀成辩护。但是，这种說法現在已經站不住脚了。

又有人說：忠王在自述里确实写了一些污辱自己、奉承敌人的話，甚至表示要向敌人投降，虽然这些話对李秀成的英雄事迹來說是个污点，但是那都是假的。忠王的目的在于利用“伪降”来爭取敌人的寬大，以保存革命力量，同时利用敌人的內部矛盾，分化滿汉統治者，并且爭取曾国藩調轉枪口去对付外国侵略者。主张这种說法最力的是罗尔綱先生。为罗尔綱先生《忠王李秀成自传原稿箋

証》作序的周鵠先生也支持罗尔綱先生的意見。整理出版了自述部分真迹的梁岵庐先生和校补自述刻本的呂集义先生，也說李秀成是“伪降”。

相当一些人同意了上述的意見。有些中国近代史的作者，在自己的著作里，也以上述的觀點解釋了这一頁历史。

忠王不忠，历史的事实遮蓋不住

問題真的解決了嗎？沒有。

历史是客觀的存在。客觀的历史真象是不能更改的。

李秀成是中国近代历史上一个有才干的农民革命軍将领。他在太平天国后期的革命斗争中起过很大的作用。李秀成在太平天国革命史上的这些功績是應該予以充分估价的，是不能抹煞的。但是，他在被敌人俘虏以后丧失革命气节、背叛革命事业的事实，也是否定不了的。在他的自述里，頌揚敌人、詆毀革命的話是那样的清楚，那样的明白，以致任何辯解在这种冷酷的事实面前都是难以令人信服的。

李秀成在自述里美化了敌人。他一而再、再而三地用最美丽的字眼称頌太平天国的死敌——曾国藩、曾国荃兄弟。他贊美臭名昭著、軍紀敗壞的湘軍。在自己的兄弟姐妹、父老妻儿被敌人残酷屠杀的时候，一个革命将领，却昧着良心去称頌那些最反动的杀人劊子手，难道这还不够可耻嗎！？

美化敌人，必然要丑化自己。李秀成也不例外。在自述里，太平天国伟大的革命斗争竟然被說成是“忽（屈）悞英雄”、“悞死世民”，“违犯天命”、“害民害众”，“先机之定数”、“世人之劫数”。在自述将近完毕之际，他懊丧地叹道：“何生天王而乱天下，何我不才而佐他乎？”①

李秀成在自述里对天王洪秀全的責备特別苛刻。他批評天王“不問賢良”、“不問国事”，“不修得（德）政”，“不以軍民为念”，責备他“用人不专，信人之不实，逸侈（佞）张揚，明賢偃避，豪杰不登”②。但是，在这方面他所举出的事实，则有不少是

不眞實的。應該說，洪秀全不是沒有錯誤的，同時也不能要求李秀成正確地評判洪秀全的功過；但是，無論如何他不應該用一些歪曲了或者夸大了的罪名在革命領袖的臉上抹黑。

他這樣指責天王，夸大他跟天王之間的矛盾，實際上包含着在敵人面前表白自己的意圖。他把自己的革命歷史描繪成這樣：他一开始就是受“惑教”而參加革命的，“自拜上〔帝〕之後，秋毫不敢有犯，一味虔信，總怕蛇虎傷人。”^③“我自小為民不知，勇敢而來”，一路“迷迷而來”，“蒙蒙而隨”，“造成今日患害”，“情知此事者，能死亦不能為也”^④。他把自己在太平天國後期率領革命群眾取得的巨大勝利說成是：“初任重事，又不周詳，糊糊塗塗而作，此時國未當絕，亂作而成，亂行不錯，故而保至今也。”^⑤他說，他之所以仍舊呆在革命隊伍里，不過是“奇（騎）上虎輩（背），不得不由。”“我生世亦未悉天命之先排，若人能先有先知，何肯違犯天命，逆天行事？何人愿作不良（不）義不孝？何人而肯輩（背）井窩（離）宗，窩（離）親別友，去戚窩（離）鄉？”“我不故（過）在秦為秦，為（在）楚為楚”^⑥。除了強調自己沒有革命意識以外，還表示他早因為自己“本是忠直賢良，〔不〕幸未逢明主”，而有動搖之意了。只可惜清軍“凡拿是廣西之人斬而不赦”，不然，太平軍“解散久矣”。“因我粵人，無門他入”，所以才堅持革命至今。如果這次“曾中丞大人以及老中堂能以奏清（請）聖上，肯赦此粵之人，甚為美甚”^⑦。

李秀成在自述里，不僅絕不隱瞞他思想的動搖，而且也不掩飾他一度有過的投降活動。

南京保卫戰最危急的時刻，李秀成的一個妻舅宋永祺出城同曾國荃營下的一個師爺拉上了關係，商談了投降的事。大概這個人不善于做叛賣勾當，以致來往十幾天，還沒有得到實情。宋永祺嗜酒，醉後失言，把李秀成同他談的一些機密要語，向一個想投敵叛變的松王陳德風講了，陳德風得了風聲就寫信來問。恰巧這天李秀成正在府中召開糧務會議，陳德風的信為補王莫仕葵順手打開了，大家看了信就質問李秀成，隨後又把宋永祺押了起來，準備正法。

这样一来，事情弄大了，鬧得“合城惊乱”。“朝臣”們也都不同情李秀成。后来亏得李秀成用銀子疏通了莫仕葵，才把事情平息下去。李秀成在自述里說：“自此之后，四时有人防备，恐我有变心。”⑧

不但如此，他还反复強調自己过去已經做了許多有利于清軍的事情，来向敌人表“功”。

表“功”的表現之一，是一再地說自己过去如何礼待获自“大清皇上”的俘虏。

有人认为这主要是为了以优待俘虏的政策去爭取敌人。就算是这样吧，那末，在李秀成自己变成了敌人俘虏的时候，还講这些，却又是为什么呢？这时已經沒有敌人可爭取了，講这些話恐怕还是为了让敌人“爭取”自己吧。李秀成自己說：“非我參是好言，光我之溥（薄）面，皇天明照，不敢隐瞒。”⑨不是表“功”是什么！⑩

表“功”的表現之二，是一再地說自己过去如何寬恕投靠“大清皇上”的革命叛徒。

赫赫有名的忠王，原来是个軟骨头，这真出乎反动派的意料。老奸巨滑的假道学家曾国藩对付軟骨头当不乏手腕，于是在两次“深惠厚情”的談話之后，这个所謂“万古忠义”的忠王終于向反动派递交了降表。自己投降了不算，还要替反动派在大江南北打起招降的白旗。

自述的最后部分被曾国藩撕毀了，但是，就在最后几行間，堂堂天朝的軍事統帥已經自认为是“大清民根”了，而革命軍队和革命群众，则变成了“众匪”⑪。

据曾国藩的幕僚赵烈文說，李秀成在死前，还写了十句絕命詞，“叙其尽忠之意”⑫。許多人拿这件事來証实李秀成的“凜然气节”，可惜原詞沒有留下来，否则或者可以为这种說法找到一些实在的根据。但是，就算是为太平天国的革命事业尽忠吧，已經太迟了。“既干进而务入兮，又何芳之能祇”。把詩詞化为长江的波涛，也洗不淨这一頁投降变节的可耻記錄。

总之，无情的事实說明了：李秀成的自述并不是为总结太平天国革命的經驗教訓而写的“革命文献”^⑬，它只不过是为投降的目的而写的一个背叛太平天国革命事业的“自白書”。

問題的焦点是怎样評斷李秀成的动机

分明是一个投降变节的“自白書”，可是罗尔綱等先生却說这个投降是假投降，說自述里那些“頌讚敌人、污損自己”的話，都是欺騙敌人的。

問題的焦点是怎样評斷李秀成的动机。

毛主席說：“我們是辯証唯物主义的动机和效果的統一論者”。^⑭評斷历史人物主觀动机的好坏，唯一的标准是他自己的社会实践。李秀成背叛太平天国革命事业的自述，是他投降变节思想的合理的产物。

我們且分析一下李秀成提出的十条綱領，即“招降十要”。李秀成认为，“天朝之根已去，能收复此等之人众齐来”，就可以迅速平定天下，“免大清心腹之患再生”^⑮。“招降十要”就是为这个目的而提出的。

“招降十要”的办法之一，就是用“恩赦两广之人”的政策，瓦解最坚决的革命队伍。“肯散两广之人，其各易办”。他主张利用太平軍的俘虏作宣传工作，以使“人人悉中堂中承（丞）寬恩赦他，其心免結，图事速成”。他又建議曾国藩“出示各省远近州县乡村，言金凌（陵）如此如此，今各众不計何具（俱）赦，仍旧为民”^⑯。

在这里，李秀成又一次表示要利用天朝統帥的威信，亲自参加招降活动。

李秀成在“招降十要”的結尾部分里說：“昨夜承老中堂調至駕前訊問，承恩惠示，真报无由。罪将一身屈錯，未逢明良，今見老中堂恩广，罪将定要先行靖一方酬报。昨夜深惠厚情，死而足愿，欢乐归阴。”

在这里，分布在大江两岸的太平軍变成了李秀成晋見新主人的

見面礼。罗尔綱先生在《箋註》里說，李秀成这里写的“罪将”，并不是向敌人“低头”，而是說罪在“不能保卫太平天国”；“死而足愿，欢乐归阴”的話，表明李秀成早有了为革命而死的决心⁽¹⁷⁾。罗尔綱先生似乎錯誤地領会了李秀成的意思。李秀成的“罪将”明明是向敌人表示忏悔的自称；“死而足愿，欢乐归阴”明明是向敌人表示忠心的諛詞。翻譯成現代的話，就是：“我的罪大极了，您老却这样的恩待我，真使我粉身碎骨难以报答。今后为您赴湯蹈火，牺牲生命都是心甘情愿的。”試問，从这里能够找出什么为革命而死的决心呢？

李秀成的招降計劃，共分三步：

第一步，“先收我儿子为先”，要曾国藩准他找人带着他的亲笔信，去办这件事。

第二步，“要收我堂弟李世賢为首。李世賢之母亲及其家眷概被苏州李撫台溧揚（阳）带云（去），业寢养重代（待）。欲收我弟，速見攻（功）者，求中堂行文取其母到皖省，我行文前去，可速成功定也。其視（事）母至孝，今我被擒，办此者之易甚也。”李世賢部是太平軍在长江以南的大股部队，招降李世賢是消灭太平軍的重要一着，清廷对这件事很重視，李秀成死后，还下諭旨向李鴻章查問情况。李世賢后来沒有投降清朝，但是李秀成为了招降李世賢竟然想拿人家的母亲做人質，簡直是不择手段了。

第三步，儿子、堂弟“收复”以后，再收听王陈炳文。“陈炳文与我至爱，两好作为亲亲。我今被获在此，我文至，其定肯从。其各肯从成此事，因我在此，各有去路，定而成也。陈炳文从，汪海洋亦至，我家弟从，朱兴隆、陆順（順）德从之定也”。“又收黃文金”，“其事定成”。“天朝独我部众，我将我部收齐，其余各記（寄）話而从。”

李秀成南京突围时保护过的幼主，現在变成了重新檢驗他政治立場的試金石。他知道，他必須对这个重大的原則問題表示态度，否則新主人就不会信任他。

他解釋道，他过去保护幼主，是一种“愚忠”。他估計幼主一

定在突围时被杀害了，“此人必不能有了”；但是，万一幼主沒死怎么办呢？幼主，这点象征革命的骨血，对有过“朱三太子”鬧事經驗，又受过农民大革命浪潮冲击过的，腐朽圮〔 pǐ 匹 〕敗的清朝統治者，却是一个危险的人物。怎么回答这个問題呢？李秀成彷徨了。曾經主张“不計是王是將”，都“赦其死罪”的忠王，对这个老天王临危托孤、清白无罪的小主人，也爱莫能助了。“查納（幼）主果能到处，再有別样善謀，又再計效（較）”。李秀成的“鉄胆忠心”，在这里完全破碎了。

李秀成还表示，在天朝将兵“收復”以后，他还愿意为鎮压北方的农民起义軍效犬馬之勞。“罪將邦（帮）筹為引……穩（捻）匪作亂，舉手而平。”¹⁸这真是最彻底的背叛了。

这些事实，这些彻底叛卖革命事业的行动綱領，难道還不能說明李秀成的真正居心嗎？

李秀成的“招降十要”，每一条都可以馬上实行，而且都可以立即收到应有的效果。当然，在实行的过程中，也一定会遇到坚决革命派的抵制；但是，它仍然可以帮助敌人更快地摧毁大江南北的革命队伍。

李秀成不会“助桀為虐”，干出这种卑鄙的劝降勾当嗎？請看他向敌人立下的軍令狀吧。“如办不成，正國法是定。”他的头顛和热血已經为他投降的决心作了担保。

是真投降还是假投降，李秀成自己不是清清楚楚地答复了嗎？这就是我們評斷李秀成动机的根据所在。

能不能說，李秀成的招降是为了保存革命群众的力量，也就是“保民为乐”呢？

对革命群众，李秀成确实主张“亭(停)刀勿杀”。不杀当然比杀好，但是，李秀成的不杀是有条件的。这条件就是：彻底投降，不再革命。从太平軍出来的李秀成深知，革命群众是“杀之不尽”的，而且杀的越多，反抗的也越多，所以“平定天下”要以“仁愛为刀”。否則，“虽中堂兵欲爭，能平此等，实有費力費財”，而且“尔兵到此，其又去彼（彼），何不有乱于民？彼为（围）严

紧，尚有計他逃，不独該在外許广野而无別計者乎？”由此看来，李秀成这种以“仁爱为刀”的不杀办法，对反动派来说，倒的确是一种大有好处的万善之策。难怪乎杀人如麻的“曾剃头”曾国藩，看了这一段話，也要向皇帝說“其言頗有可采”了^⑯。

也許，在李秀成自己想來，他为了保存自己的生命，甘愿从此作一个“順民”；他想保存自己儿子和部下的生命，也必須誘使他們都变成甘愿被套上奴役之轭的“順民”。但是这种想法本身就是投降变节者特有的可恥的想法。他所設計的招降办法并不是什么保存革命实力的策略，而是一种瓦解革命实力的策略。革命群众的生命既不能用乞求的办法保存，更不能用投降的办法保存。革命群众的生命只能依靠革命群众自己机智、英勇的斗争来保存。

能不能說，李秀成是为了挑起滿、汉統治阶级的内部矛盾而投降曾国藩的呢？

这种說法也是缺乏事实根据的，至少，从現有的材料里，找不出这种根据。相反，我們从李秀成的自述里，只能看到他經常把“中丞大人”、“老中堂”和“大清皇上”并提，而且总是把“大清皇上”写在前头。此外，在他的自述里，歌頌“大清皇上”的詞句屢屢可見。从这里似乎找不出一点挑起滿、汉統治阶级内部矛盾的线索。

曾国藩、李鴻章、赵烈文这些鎮压农民革命頗有經驗的巨奸大慾們对李秀成的态度是看得很清楚的，他們并不认为李秀成是“伪降”。曾国藩对李秀成的評論是：“宛轉求生，乞貸一命”，“獻諫乞怜，无非图延旦夕之一命。”^⑰赵烈文在日記中两次記述李秀成“有乞活之意”，“有乞恩之意”。至于李鴻章对李秀成的看法就更难堪了。李鴻章本来对李秀成非常害怕，在来往文書里有时称他为“忠老”，后来知道李秀成写了一个投降的自述，在致曾国荃的信里說：“穿虎乞怜，曾狗鼠之不若，殊可嗤也”。

既然如此，曾国藩等人为什么不接受他的投降，反而认为“此賊甚狡”，“不宜使入都”，而且迫不及待地把他杀了呢？

这个問題并不难理解。李秀成在整个革命战争期間始終活跃在

最前綫，又是后期太平天国最主要的將領之一，他对于战争的經過是了如指掌的，曾國藩、李鴻章和清軍其他部队狼狽潰敗、腐敗无能、奸淫擄掠以至欺君卖国的种种劣迹在他脑子里有一本清賬。他在曾國藩面前固然尽量頌揚这位“侯爷”，但是对李鴻章就并不客气，隨筆拈出几件事情，就揭了李鴻章的老底。假如准他投降，清廷一定会命他入朝，誰能担保他到了北京不会照样把曾國藩的丑事揭露一番呢？曾國藩深知清廷对他是非常猜忌的，而他十几年来虛誑欺騙朝廷的勾当又不知有多少！虽然李秀成自述里沒有挑起滿漢統治阶级內部矛盾的意思，但是曾國藩却不得不深加戒备。他权衡反革命利害的輕重，就断然把李秀成送上了断头台。

“生当做人杰，死亦为鬼雄”，李秀成却含着羞憤的眼淚，怀着失节的悲痛，回到了他的“天国”。

談字里行間的“革命立場”

呂集義先生說：李秀成的自述“字里行間仍然到处表現出他的堅定的革命立場”。他举出了实例，如“在時間上写的是太平天国天曆”，“在称謂上仍然称‘天朝’、‘天国’”，写上帝、天王时抬格等。罗尔綱先生也认为李秀成的自述，其“文字的实质和精神，依然表現着堅定的立場”。他还說，对这一点“不仅要从中国传统春秋史笔的書法去体会”，而且还要和当时的叛徒听王陈炳文、宁王张学明等人在投降文書里污蔑天朝的军队为“賊匪”、“賊壘”，称頌清朝的法令为“欽命”、“国法”等作比較②。

怎么解釋这些現象呢？既然李秀成要投降了，为什么在自述里还使用着革命队伍里的称謂，保持着太平天国的用語习惯呢？

什么事情都有发生、发展的过程，投降变节也不例外。决定投降变节是一回事，养成投降变节的全部心理和习惯又是一回事。李秀成可以在一个极短的时间裡作出投降变节的决定，却很难在一个极短的时间裡养成投降变节的全部心理和习惯。一个历史学家說过，“臣妾签名謝道清”的南宋皇太后，当她手拉着小孙子朝見忽必烈大汗的时候，她还没有养成全部的奴才心理。同样道理，在农

民起义烽烟里翱翔过的雄鹰李秀成，当他被敌人抓住，决定投降变节的时候，他也还没有具备完备的叛徒心理。这一点李秀成自己意識到了，他在自述里，不是明白地向曾国藩的“师爷”們說，“恐有违犯字样，是煩勞清心改除可也”²²嗎！如果有一个“师爷”，真的按照李秀成的請求，替他把“时逢甲子”一类的話，改为“同治三年”，李秀成大概不会提出抗議吧！

决定問題性質的是自述的根本立場，而不是某些習慣稱謂。

太平天国的另几个叛徒在投降文書里污蔑天朝，称頌清朝，这当然是无恥之尤了。这說明他們的叛變思想早就成熟了。但是拿这几个叛徒作尺子，仍然否定不了李秀成投降变节的事实。事实上，在李秀成自述的最后部分，所謂“字里行間”的“革命立場”或者什么“春秋史筆的書法”，再也找不見了。在这里，农民的“起义”，已經变成了“乱民”、“害民”；革命方面的“失”或者“失守”，已經变成了“大清”王朝的“收復”或者“平定”，最严重的是太平天国的革命軍队和革命群众，在这里已經被称为“众匪”了，这个字眼已經和叛徒的口吻完全一致了，至于称清朝的法令为“国法”，則早就有了。

可見，只要投降变节，就会认贼作父。心理和習慣上的不協調、不一致終究只是暫時的現象。

关于“防鬼反为先”

李秀成的“防鬼反为先”的思想，經常被当作証明他并非真投降的論据。“防鬼反为先”的确是值得肯定的。但是这一点也洗白不了他投降变节的錯誤。

封建反动派和外国侵略者同是太平天国革命的敌人。在太平天国的革命者看来，一个是“妖”，一个是“鬼”。投降了“妖”，請他来防“鬼”；或者投降了“鬼”，請他来反“妖”，同样都減輕不了他背叛革命事业的錯誤。利用敌人的内部矛盾来进行革命斗争，是一种革命的策略；但是叛变了自己的阶级，并且企图不择手段地替反动派作招降工作，甘心情愿地去帮助敌人“平复”“众

匪”，“安定”天下的人，是談不上什么革命策略的。

太平天国的革命事业是在封建反动派和外国侵略者的联合进攻下失敗的。“妖”、“鬼”尽管有矛盾，但是还是一家人。如果背弃了太平天国的革命事业去投降封建敌人，企图請他們来防备外国侵略者，那只能是一种无法实现的幻想。

从太平天国起义到失敗的十几年里，中国历史上曾經有过两个阶级在战场上同外国侵略者相遇过。地主阶级很快向侵略者妥协、投降、割地、赔款；而农民阶级进行了英勇的战斗，給予侵略者严重的打击，并且以自己坚决反侵略的光輝榜样，激发了后人的英勇斗争。历史事实証明，抗击外国侵略者，只能依靠革命的群众。一个曾經依靠革命群众同外国侵略者作过斗争的农民领袖，背弃了革命的路綫去投靠封建反动派，而且还幻想依靠他們来反对外国侵略者，这在历史上不是进步而是退步。

李秀成投降变节是不是因为历史条件的限制？

有人用“历史局限性”的观点来为李秀成的投降变节行为辩护。他們說，李秀成在自述里所以“夹杂着一些对敌人过分期待的话語”，是因为他“对阴险狠毒的阶级敌人认识上有历史的局限性”，是因为“农民革命的局限性”^{②3}。

如果这种說法是指：李秀成的投降变节作为旧式农民革命中常常会出现的现象之一，是这种农民革命的历史局限性的一种表现，这是对的。

但是，如果认为因为旧式农民革命有着一定的局限性，所以，投降变节行为对于李秀成来说就是难以避免的，是不必加以责备的，是可以原谅的，那就完全错了。

农民群众的英勇斗争在新的社会阶级形成以前是历史的唯一的动力；没有这种斗争，历史就不能前进一步。自己放弃斗争，还以策划招降的办法来协助封建統治者瓦解这种斗争，这不是历史对他的局限，而是他对历史的反动。

旧式农民革命打击了封建統治者，但是不可能推翻封建社会。

农民群众认不清封建制度的本质，他们常常反对旧日的坏皇帝，而拥护新的所谓“好皇帝”。但是李秀成却不是这样，他是去拥护坏皇帝，而污蔑自己的天王；他是企图去帮助当时农民群众正在反对的坏政权，而出卖自己的太平天国。这不是农民阶级的意识局限了他，而是他对农民阶级的背叛，是对他对农民阶级的罪行。

同李秀成一样出身、一样成长、一样失败被俘，有着一样的局限性的许多别的太平天国将士，却没有象他一样投降。

英王陈玉成在一八六二年（同治元年）被俘虏了，胜保劝他投降，他宁死不从，而且还描述胜保打败仗的情形讥笑敌人。后来终于被残酷杀害了。

也许有人想李秀成被俘的时候，南京已经被敌人攻破了，历史条件还是有些不同。那末我们看看另一些历史人物吧。

有一个差不多和李秀成同时被俘的太平天国领导人，这就是干王洪仁玕。他在反动派面前自称“本藩”，直指敌人为“妖军”。他崇高的气节，坚定的立场，视死如归的决心，表现了太平天国英雄们为革命不怕牺牲的伟大精神。

遼王賴文光在南京城破以后仍然继续在长江北岸艰苦地同反动派作坚决斗争。他联络并且领导了北方的农民起义兄弟捻军，把清朝名将僧格林沁和曾国荃的新湘勇打得落花流水。不幸一八六八年（同治七年）兵败被俘，他对惨酷的刑戮毫无畏惧，真是赤胆忠心的铁打汉。

同一时代，同一种历史条件，却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物。一种人宁死不屈，慷慨赴义，另一种人投降变节，屈膝媚敌。怎么能用“历史局限性”来为后一种人辩解呢？

英雄为什么还会投降变节？

历史上有过这样的英雄，他们曾经骑着骏马，驰骋在疆场上，同敌人进行过殊死的战斗，但是他们最后却经受不起失败的考验。

“十众灭兮，名已墮”，在军队溃散，身陷困境的时候，他们的风云壮志消失了，于是丧师辱志便接踵而来。这种人在太平天国的历

史上也不是个别的。苏州的叛将“渺一目”，屡次打败英法侵略军的宁王周文嘉，上面说到的忻王陈炳文，都是这样的例子。

李秀成的投降变节不是偶然的。

从他的自述里可以看到，他虽然曾经进行过英勇的战斗，但是在他的思想里，对于洪秀全、楊秀清等人倡导的太平天国的革命理想，一直缺乏明确的认识和坚定的信念。他在太平天国后期斗争越来越困难时，就逐渐失去了对革命事业的信心。他形容自己是“骑在虎背，不得下骑”。因此，一旦别人能把他从“虎背”上拖下来，他是不会再坚持革命气节的。

他在参加革命以前受到许多封建思想的感染。所谓“天命”、“天数”、“明良”、“明主”、“在秦为秦，在楚为楚”一类东西，都是这种思想遗毒的反映。

他虽然是贫苦农民出身，但是从士兵变元帅以后，首先从生活上，慢慢从思想上逐渐背离了本来的阶级。做了元帅以后的李秀成并没有保持他艰苦朴素的作风。

十年壮丽的天王府，早已烟消云散，洪秀全的宫殿已经找不着了。但是“忠王府”的遗址，仍然在苏州的“拙政园”任人凭吊。

“忠王府”是个未完的工程，几千个工人长期建筑了三年多，到苏州陷落时仍未竣工。王府的设置富丽堂皇，“内外四五十间，纯用金银装饰。”^②叛徒献城以后，李鸿章入据苏州，这个骄奢淫逸的反动将军见了“忠王府”也不禁叹道：“琼楼玉宇，曲烂洞房，真如神仙窟宅。”^③

李秀成的金银财宝也不少。有一次因为同洪秀全闹矛盾，被勒令交出饷银十万两。南京陷落以前，他说自己银米都没有了，但是为了给叛徒陈德凤等人疏通，一次还能拿出成千两的银子。

具有象征意义的一件事是李秀成的性命，最后竟给一堆珍珠宝物断送了。

“我命该绝，……身上带有宝物，用綉紗带捆带在身，那知此日心如此之迷，到此破庙亭（停）息，将此珍珠宝物吊在树下，……那邦（帮）百姓得我宝物，民家见利而争，带我这邦（帮）百

姓，去問那邦（帮）百姓，两欲分用。被邦（彼帮）百姓云：‘尔問我分此物，此物是天朝大头目方有，如（余）外別无。尔必拾获此头目。’……因此我藏不往（住），是以被两国（个）奸民获拿。”^⑯

此日的“心迷”，乃是往日“心迷”的結果。李秀成当初如果不貪恋这堆珍珠宝物，他是可能安全回到自己部队的。

明朝末年，被清軍俘虏的洪承疇，因为屡次拂扫衣服上的尘土，被范文程窺破了他心理上的秘密。“一衣犹爱惜如此，况其身耶？”果然，正当崇禎皇帝准备亲自为这个道德典范举行祭奠的时候，他已经披上了皇太极的貂裘，做了滿族統治者的奴才。既然如此，我們对国破家亡时尚念念不忘珍珠財宝的李秀成，又怎么能企望他坚持革命气节呢？

李秀成的自述作为一种太平天国的史料，有重要的价值。但是，現在的問題不是史料价值問題，而是对它的根本評价問題。

由于李秀成已經不仅是历史学家研究的对象，而且是各方面拿来在群众中进行广泛宣传的人物，因此，正确地估計他的表現具有格外重要的意义。

我們祖国人民的光荣斗争傳統是反抗阶级压迫，反抗民族压迫的革命传统。中国近代史上許多可歌可泣的革命斗争正是这种傳統的繼續。在太平天国的历史上，我們也看到了这种光荣的斗争傳統。洪秀全、楊秀清、蕭朝貴、馮云山、林鳳祥、李开芳、陈玉成、譚紹光、洪仁玕、賴文光以及成千上万的革命战士，尽管他們有这样和那样可避免的或者不可避免的缺点和錯誤，但是他們坚持了反对封建压迫、反对外国侵略者的斗争，为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革命的胜利开辟了道路。他們在革命事业遭到失敗，个人生命遭到威胁的时候，仍然繼續斗争，絕不变节。他們赤誠的革命忠心，磅礴的革命气概，在阶级斗争的历史上永远发射着不朽的光芒。他們才是我們历史上可敬爱的革命英雄，我們应当承繼的正是这种光荣的斗争傳統。李秀成呢？虽然他在太平天国革命史上起过很大的作

用，但是他最后却丧失了革命气节，背叛了太平天国的革命事业。他的自述既不能代表我們历史上的光荣斗争传统，也不能作为鼓舞后人战斗的榜样。

如果我們尊重革命的历史、尊重历史唯物論的真理，我們便不能让变节分子的“自白書”繼續彪炳于革命的史册。

①各見《忠王李秀成自述校补本》（以下簡稱《校补本》），廣西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一年版，第二十九、五十一、五十二、一二二頁。本文引用李秀成自述原文，均已按自述原稿影印本校改过。

②《校补本》，第二十八、四十三、五十一、一〇八頁。

③《校补本》，第六頁。

④《校补本》，第十九、二十九、五十一頁。

⑤《校补本》，第三十三頁。

⑥《校补本》，第二十九、四十七頁。

⑦《校补本》，第十九、四十四、九十三頁。

⑧《校补本》，第一〇六頁。

⑨《校补本》，第五十六頁。

⑩据曾国藩的幕僚赵烈文記載，李秀成在一次談話中曾經向他說：“至于用兵所到，則未嘗縱殺，破杭州得林福祥、米兴朝皆礼之。官眷陷城者，給票护之境上，君独无所聞乎？”也是一种表“功”的口气。見《太平天国史料丛編簡輯》第三冊，第三七四頁。

⑪《校补本》，第一一九、一二一頁。

⑫《太平天国史料丛編簡輯》第三冊，第三八一頁。

⑬有人根据《清史記事本末》的一条材料，說李秀成在写自述以前对清朝官吏說，“速将紙笔来，吾当書之，吾史館实录为尔曹焚掠尽，吾不述，奚以传后”。但是，这条材料在目前已經发现的目睹李秀成写自述經過的人的記載里，都不能得到証实。

⑭《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八九〇頁。

⑮《校补本》，第一一九頁。

⑯这里以及以下所引“招降十要”原文，均見《校补本》，第一一三至一一八頁。

⑰《忠王李秀成自传原稿箋証》（以下簡稱《箋証》四版，第三十五、六十四頁。

⑲罗尔綱先生曾經在一个注解里說：“忠王所說的‘擒匪’，乃指蒙城、亳县起义群众里面扰害人民的分子。……那些扰害人民的坏分子，在革命内部看來，也还是以匪看待的。”（《箋証》四版，第一二五頁）